

网络文化建设研究丛书



Network
Network
Network
Network
Network
Network
Network
Network

微博反腐信息传播

——案例解析与舆情分析

邓秀军 著

The Anti-corruption Movement on Weibo:

Case Study

and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网络文化建设研究丛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基于社会计算的微博舆论生成模式与引导机制研究”
(项目编号: 12YJC860011) 资助成果

微博反腐信息传播

案例解析与舆情分析

邓秀军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微博反腐信息传播:案例解析与舆情分析/邓秀军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4
(网络文化建设研究丛书)

ISBN 978-7-5680-2710-6

I. ①微… II. ①邓… III. ①互联网络-应用-反腐倡廉-研究-中国 IV. ①D630.9-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8146 号

微博反腐信息传播:案例解析与舆情分析

Weibo Fanfu Xinxi Chuanbo: Anli Jiexi yu Yuqing Fenxi

邓秀军 著

策划编辑：杨 玲

责任编辑：郑京津

封面设计：原色设计

责任校对：李 戈

责任监印：徐 露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电话：(027)81321913

邮编：430223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 刷：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8.5 插页：2

字 数：166 千字

版 次：2019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The **A**nti-corruption
Movement on Weibo:
Case Study and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自我暴露”微博反腐 /8
第一节 周文彬“自首式”举报事件 /9
第二节 “郭美美微博炫富”事件 /15
第三节 谢志强微博开房事件 /20
第四节 王鹏飞的“坑警女友” /23
第三章 “熟人爆料”微博反腐 /28
第一节 雷政富“不雅视频”事件 /29
第二节 广州“房叔”蔡彬案 /38
第三节 女主播纪英男曝范悦包养案 /43
第四节 上海法官集体嫖娼案 /48
第四章 “人肉搜索”微博反腐 /53
第一节 微笑局长“表哥”杨达才 /54
第二节 李亚力之子酒驾袭警 /65
第三节 白勇强转发第一案 /74
第五章 “实名举报”微博反腐 /83
第一节 罗昌平举报刘铁男事件 /84

第二节 王文志举报华润宋林案 /94
第三节 陆群与“金银花更名”事件 /101
第四节 人大代表举报狂犬疫苗事件 /109

第六章 结语：意见领袖主导下的微博反腐 /113

参考文献 /124

后记 /129

第一章

绪 论

腐败是我国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先后提出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加强反腐败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明确强调要通过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来进行反腐。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表明中国共产党持续反腐的坚定决心。微博曾经是国内影响力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也是反腐信息发布和传播的重要媒介渠道。面对强大的舆情聚变能力，能否准确及时地发现和处理反腐信息、能否合理有效地监测和引导反腐微博舆论，是构建微博反腐机制，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关键。

一、研究现状及意义

微博反腐是使用微博进行反腐信息传播的一种舆论监督手段，通过微博平台曝光涉腐行为或收集腐败线索来监督公职人员的行为，从而达到有效预防腐败和惩戒腐败行为的一种反腐方式。^①微博平台用户自制、关系主导的信息传播会产生海量（人工抽样无法有效获取）的数据流，通过聚焦用户行为的数据分析，能够揭示微博反腐舆论的生成模式，探索反腐舆情收集、研判、处理和引导的有效机制，最终实现腐败行为的惩治和预防。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作为社交媒体政治传播研究的一个子类，微博反腐研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从研究对象的领域迁移，到研究方法的多维互动，微博反腐研究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研究对象，而是一个多学科交叉、多方法互融的研究场域。

1. 微博反腐与社交媒体反腐舆情研究

由于涉及舆论监督、政务公开、网络民主、政治改革等诸多相关研究领域，目

^① 邓秀军. 生产性受众主导下的微博反腐：路径、模式与立体关系[J]. 现代传播, 2014(4): 127-131.

前国内的微博反腐研究主要在跨专业的背景下展开。首先，基于学科背景和研究方法的制约，国内新闻传播学科最早对微博反腐的时代背景、传播特点和社会影响有所关注（荆学民，2013；魏武挥，2013；邓秀军，2013；郭斌，2013；何震，2013；雒有谋，2013；谢太平，2013）。微博反腐研究主要散见于管理学、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主要有舆情研判（沈阳，2012；杜治洲等，2012）、权利维护（涂永珍，2012；蔡宝刚，2013）、应对策略（付海梅，2013；龙太江等，2013）和制度变革（刘晨，2013；杨爱平等，2013）等主题。其次，国内与微博反腐有关联的研究主要分为三方面：使用微博作为信息传播工具的网络反腐（韩恒，2011；魏永征，2013；张淑华，2013；李彪，2013；庹继光等，2013）、微博舆论监督的反腐信息传播（展江，2011；曾凡斌，2013；邓晓旭等，2012；李东等，2013）和政务微博的信息透明与舆情应对（黄河，2012；刘瑞生，2013；张宁，2013；孙振虎等，2013；李建伟等，2013）。总体而言，国内既有的微博反腐舆情研究，主要是针对零星个案的经验式实证研究，较少在系统的理论梳理上用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对微博反腐舆情做系统全面的实证研究。

相对而言，国外的社交媒体反腐研究以量化分析实证研究为主，基于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差异性，国外的社交媒体反腐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地域：拉美、东欧和亚洲，研究主题主要有社交媒体在反腐中的角色功能（Matheus&Ricardo, 2012；Rao A, 2012；Mo&John S J, 2013）、反腐舆论的生成模式（Gomes&Alan Keller, 2012；Ding Z J, 2011）以及对政治体制与机制的影响和革新（Toepfl&Florian, 2011；Arnold&Jason R, 2012；Zhou Y R, 2012）。同时，国外与社交媒体反腐有关联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作为电子政务的社交网络信息发布（Bertot, 2010；Mon-Chi Lio, 2011；Rajeev, 2012；Bruns, 2013）和社会化媒体的政治参与（Aday, 2013；Ausserhofer&Maireder, 2013；Elkhalili, 2013；Park, 2013）。国外的社交媒体反腐研究，从方法使用的角度而言，具有国内相关研究无可比拟的技术优势。然而，我们不可否认，国外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特色的研究者有较为常见却又难以避免的致命弱点，那就是经常把社交媒体放在一个完全独立的空间场域，用与社会其他部分完全割裂的态度研究社交媒体反腐舆情。这就容易滋生一种技术至上的态度，并产生一种社交媒体工具万能的夸大认知。

2. 微博用户与微博的数据分析

当前国内的微博用户研究使用定性研究方法的比重最大，相对较少使用量化分析。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定性研究主要从微博用户的媒体属性、传播功能和社会影响三个层面来展开。媒体属性研究有媒体微博（谭天等，2012；喻国明，2013；陈昌凤，2013；蔡雯，2013）、政务微博（相德宝，2012；谢新洲等，2013；杨凤娇，2013）、企业微博（陈致中等，2012；李建伟，2013）和名人微博（晁殊蝶，2012；庄鸿明，2013）等主题；传播功能研究有微博外交（钟新，2011；包雪琳等，2012；杜

志红等,2013)、微博动员与微公益(涂光晋等,2013;刘小燕等,2013;吴闻莺,2013)、微博舆论监督(陈卫星,2011;靖鸣等,2012;刘瑞生,2013)和话语权与政治表达(王君超,2011;胡沈明等,2012;许燕,2013)等主题;社会影响研究有微博谣言传播(陈力丹,2011;匡文波,2012;刘立刚等,2013)和意见领袖(谢耘耕等,2011;胡泳,2012;张涛甫,2012)等主题。二是量化分析以抽样调查为主,主题有舆论生成中的用户行为和关系(夏雨禾,2010)、意见领袖的发现识别(王君泽等,2011;韩运荣等,2012)和突发事件中的社会动员(涂光晋等,2012;王平等,2012)等。新闻传播学基本没有使用大数据分析研究微博用户。

相对而言,国外的微博用户研究以量化分析为主,其中数据分析从2012年开始被引入传播学研究。第一是定性研究,定性研究方法在微博研究的早期偶有使用,主要分析用户的内容生产(Kaplan,2010)、话语权分配(Keen,2010)和信誉度建构(Tim B L,2011)。第二是抽样调查,抽样调查量化分析主要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跨专业使用,除了传播学对微博用户的个人偏好(Hargittai,2011)、意见表达(Ampofo,2011)和政治倾向(Tumasjan,2011)的探索,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也使用抽样调查量化分析来研究微博用户的隐私保护(Manen,2010; Singh,2013)、政治参与(Elmer,2012; Sreekumar,2013)和信息沟通(Decamp,2012; Murphy,2013)。第三,数据分析是指对规模巨大的数据进行分析的研究方法,具有大量、高速、多样和精确等特点(Rajaraman,2012),能够快速准确地进行用户行为预测(Lampos,2012)、意见领袖筛选(Correa,2012)以及关系网络的视觉化解析(Ghosh,2013);通过用户行为追踪和情感分析(Kontopoulos,2013),能够为微博舆情的监测和引导提供可靠的依据。

3. 微博反腐中的意见领袖研究

意见领袖是指“那些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郭庆光,1999)。能够成为意见领袖的微博用户有两种:一种是加“V”的实名认证用户,另一种是有较大影响力的机构微博(政务微博与媒体微博)(靖鸣,2014);他们具有影响力大、粉丝关系稳定和个人特色鲜明等特点,往往是某一领域或社群的核心用户(张萌,2012)。微博反腐舆论生成中,有着较大粉丝量的意见领袖能将反腐事件的信息迅速推入大众视野(王咏梅,2013);这些被称作“大V”的微博账号,在爆料和调查案件中,微博信息发布实时跟进,引发众多普通民众以及权威媒体的关注,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直接推动了反腐的进程(马涛,2015)。微博意见领袖的生成主要有三种来源:第一种是公众人物的“名人效应”,第二种是草根阶层代表的“粉丝效应”,第三种是官方微博的“权威效应”(朱微,2011);同时,学者、媒体人和作家因为微博语言个性独到、思想深刻具有启发性,有大批的追随者,被认为应该是作为第四种意见领袖的“知识

精英”(李义菲,2013)。

意见领袖的舆论引导功能一般从三个阶段来实现。第一阶段:舆论发酵期,引导信息流。第二阶段:舆论高涨期,影响信息流,消除噪音流。第三阶段:舆论消散期,总结事件经验(陶睿,2013)。因此,意见领袖在微博舆情演变中的功能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发布传播信息,扩大舆论影响范围;引导观点行为,推动舆论高潮;设置转化议题,影响舆论走势(阳露,2014)。意见领袖不仅仅是将消息传播出去的重要节点,他们的观点可以影响整个舆论的走向,因此意见领袖的传播伦理和自我管理就显得十分重要。同时,我国社交媒体平台的意见领袖也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个人意见领袖在专业议题的舆论中的影响力普遍较弱;媒体类意见领袖在新闻性更强的话题类舆论中的效果较好;“大V”特别是名人类“大V”的把关人作用正在逐渐弱化;微博使用者中80后的年轻人占比高达90%(于美娜,2015)。基于这些不足,舆论生成会导致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部分意见领袖妄语失语,造成网络暴力;发布、转发虚假信息,滋生谣言;非理性表达,导致舆论“群体极化”现象(朱微,2011)。

总体而言,目前国外的社交媒体反腐和社交媒体用户研究以实证研究和量化分析为主,社交媒体反腐研究主要选择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社交媒体使用来探索舆论监督和政务公开的模式及效果,社交媒体用户研究则更多地聚焦于发达国家社交媒体用户的权利保障、利益维护和消费倾向分析。基于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和传媒体制,国外的相关研究方法借鉴价值大于理论参考价值。国内的微博反腐和微博用户研究则以定性思辨研究和描述性统计分析为主,微博反腐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探讨微博反腐产生的社会背景和使用的社会影响,微博用户研究则主要通过理论文献的梳理和消息文本的分析来进行描述性探究。基于微博信息传播的海量数据生成和用户行为主导这两个重要特点,微博反腐研究迫切需要数据量化分析研究方法的引入来提升分析模式的系统性和研究过程的科学性。

(二) 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选择微博反腐中微博用户的信息传播行为作为切入点,采取数据挖掘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案例分析研究方法,对微博用户在反腐信息传播中的行为模式、互动关系和社会影响进行内容、关系和情感分析,揭示微博反腐信息的传播机理,探索微博反腐舆论的引导机制,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 理论价值

通过微博用户在反腐信息传播中的行为动机、主体关系和功能价值的分析,揭示微博反腐舆论生成中的消息发布、信息验证、舆论扩散和政务公示机制,能够为其他相关研究提供路径方法和数据材料的借鉴和参考。

2. 实践意义

立足于数据分析系统和微博反腐事件数据库的建设,从机构设置、系统运行和政务微博等几个方面构建微博反腐信息的发现处理机制,能够为相关反腐职能部门提供制度建设、信息分析和舆情应对等方面策略参照,进而推进我国政府的廉政建设,保障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

(一) 主要内容

针对“自我暴露”“熟人爆料”“人肉搜索”和“实名举报”等四类具体的微博反腐事件类型,本书从微博消息、微博用户和微博话题三个层面进行案例分析,揭示微博消息传播路径、用户行为模式和话题聚集机制,在此基础上探讨微博反腐信息的验证和公示策略。

1. 微博反腐消息的传播路径与反腐舆情的收集研究

针对重大舆情影响力微博反腐消息的传播路径,从微博消息的文本内容、发布时机和传播路径等方面对用户的信息传播行为进行效果评估,揭示反腐信息发布和传播的有效路径,构建可操作性强的微博反腐信息发现收集机制。

2. 微博反腐信息的验证机理与反腐舆情的研判研究

针对微博反腐热点话题的信息结构与用户行为,从热点话题形成中的意见交换、信息沟通和事实印证等方面对用户的信息验证方式进行行为分析,揭示微博用户在信息筛选和甄别中的有效行为模式,构建可信度高的微博反腐信息研判机制。

3. 微博反腐舆论的扩散模式与反腐舆情的处理研究

针对微博反腐重大舆情事件的社区构成及其关系网络,从个人认知、身份认同和情感偏向等方面对微博用户的信息扩散行为进行关系图解,揭示不同类型的微博用户之间的信息转换和处理模式,构建有效性强的反腐舆情扩散与处理机制。

4. 微博反腐政务的公示流程与反腐舆情的引导研究

针对政府相关部门在反腐舆情应对中的微博使用方式,从舆情回应、过程呈现和结果公示等方面进行策略分析,构建以机构政务微博为中心,发言人政务微博和媒体微博为辅助的反腐公务信息发布系统,实现微博反腐信息的快速发现、妥善处理和及时公示。

(二) 基本观点

微博反腐实际上是一个两极对抗、群体共意的社会动员政治传播活动。一方

面，微博反腐信息的传播是腐败行为实施者与腐败行为揭示者之间的网络对抗行为；另一方面，微博反腐舆论的生成是腐败行为揭示者之间的共意动员活动。

1. 反腐信息无法快速传播

因为社会资本的制约，微博消息需要意见领袖的关注和转发才能生成舆论，普通网民发布的一般都是特征相近涉及范围较小的反腐消息，重复传播很难满足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提升需求，绝大多数有很大反腐价值的反腐消息没有生成微博舆论，微博反腐迫切需要能够准确收集反腐消息的数据分析系统。

2. 反腐信息不能有效处理

因为反腐涉及多个不同的职能部门，基于体制变革和机制构建的滞后性，微博反腐舆情的研判和处理尚处在机构权责的真空地带，反腐职能部门不能有效地从微博获取需要的反腐信息和线索，绝大多数反腐舆情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微博反腐迫切需要权责明晰的反腐舆情处理机制。

3. 治腐消息很难及时发布

因为微博舆情应对和政务公开的机制尚未有机构建，相关部门还在通过传统媒体监测和引导反腐舆论，绝大多数反腐政务信息没有合理公示。微博平台的无奈“失声”，放任了谣言等虚假信息的传播，放大了民众的失望情绪，损毁了政府的形象，微博反腐舆情迫切需要科学有效的应对策略。

三、研究设计与创新之处

选择“自我暴露”“熟人爆料”“人肉搜索”和“实名举报”等四大微博反腐类型，并在各种微博反腐类型中细分出了多个涉腐信息传播典型个案，通过微博数据的收集、相关报道资料和研究文献的分析，用数据分析与文献分析结合的方法展开研究。

(一) 研究设计

基于计算机系统良好的人机互动性能和自主学习数据处理功能，社会计算数据分析系统能够自动采集、排序和分类储存海量微博数据，并进行智能化的挖掘和视觉化的揭示。根据数据分析的规范和流程，按照数据分析系统的搭建、用户行为与信息传播机理的分析和微博反腐应对策略的提出三个步骤来展开。

1. 系统构建

梳理数据分析和用户行为分析的相关理论，搭建数据分析计算机网络系统，按照事件类型、用户关系和话题构成的结构方式创建微博反腐案例数据库（进行中）。

2. 反腐机制分析

以用户为研究核心和线索，对用户在微博反腐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个人行为、

关系结构和传播效果进行内容、关系和情感分析,揭示微博反腐的用户行为模式和信息传播机制。

3. 应对策略提出

归纳分析微博反腐的信息传播机制,针对不同类型的微博用户和不同阶段的微博舆论,构建反腐信息发现、处理和反腐舆情监测、引导机制,实现对反腐舆情的合理应对和对腐败行为的有效惩治。

(二) 创新之处

创新性地构建了微博反腐案例数据库,按照四大微博反腐事件的类型划分方式,从消息、用户和话题三个维度构建微博反腐事件的案例分析和入库模型。本书分析、归纳和图解了匿名用户、认证用户、媒体微博和政务微博等不同类型微博用户的行为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舆论引发、扩散、拓展和回应处理等响应机制和应对策略。

1. 视角选择的创新

选择微博用户作为微博反腐机制研究的切入点和关键线索,通过对用户的信息传播行为的搜索、跟踪和分析,揭示涉腐信息的传播机理,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可靠性。

2. 方法使用的创新

使用数据分析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四大类微博反腐途径的15个典型案例进行挖掘和梳理,揭示微博反腐“舆论引发”“舆论扩散”“舆论拓展”“舆论回应与处理”等环节中的信息传播机制,归纳和总结微博反腐的舆论引导策略。

“自我暴露”微博反腐

“自我暴露”微博反腐是指涉腐行为人自己在微博平台发布、传播、记录和呈现了涉腐行为的微博消息,引起微博用户和相关职能部门的注意,引发了微博反腐舆论,导致了对涉腐行为的追责和惩处。主要行为表现为炫富、约开房和晒公费旅游等,主要传播路径是腐败行为当事人无意识地在微博发布腐败行为的相关消息,被影响力较大的认证用户关注并转发,从而引起大范围的舆论关注和声讨。^①从信息传播的媒介形态角度而言,微博反腐是微博用户利用微博平台发布有关腐败的微博消息,这些包含了文字、图片、视频甚至是文章链接,记载了涉腐行为的微博消息通过事件围观和话题聚集形成微博反腐的热点网络舆情,督促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采取措施,查处腐败问题,最终达到遏制和惩戒腐败的目的。^②

微博反腐呈现出“多个大节点的次传播、中心节点的强力传播”的信息传播模式。具体而言,就是除了舆论引发阶段少数普通微博用户的信息爆料可能会受到关注之外,反腐舆论生成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都是有着较大粉丝量和较大社群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与此同时,传统媒体与微博名人、公共知识分子等关键节点类微博用户的转发使信息迅速扩散,起到了核心意见领袖的作用。^③“自我暴露”微博反腐事件除了意见领袖的参与,普通网民的围观也有着强大的舆情推动力。普通网民可以说是事件的披露者和推动者,但这些普通微博传播的信息大部分都是缺乏公信力的,致使多个群体受到伤害。^④

“自我暴露”型微博反腐主要出现在微博使用的初期,那时候涉腐行为人对微博平台的信息传播规律和舆论监督的威力还没有明确的认知,所以他们要么无意炫富、不小心“公开”地约开房、有意无意地晒优越,最终被广大微博用户发现并形

① 邓秀军.生产性受众主导下的微博反腐:路径、模式与主体关系[J].现代传播,2014(4):127-131.

② 陈艳平.当下中国微博反腐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4:9.

③ 刘畅.浅析微博反腐信息的传播特点及影响[J].新闻世界,2013(3):61-62.

④ 王丹柠.由“郭美美事件”看微博舆论监督的特征[J].新闻传播,2011(9):91.

成事件围观和话题聚集。^①本章选择周文彬“自首式”举报事件、“郭美美微博炫富”事件、谢志强“微博开房”事件等三个典型案例，从微博消息的文本内容、发布时机和传播路径等方面对用户的信息传播行为进行效果评估，揭示反腐信息发布和传播的有效路径，构建可操作性强的微博反腐信息发现收集机制。

第一节 周文彬“自首式”举报事件

周文彬原是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国土资源局干部。2011年4月13日，为了举报所在单位的领导，周文彬选择了“自首式”举报的方式，通过在微博上直播自首的过程，称自己参与单位的贪污行贿，此事迅速引发网友围观。最终纪律检查部门对收礼的官员做出处理。这一事件标志着网民通过微博平台进行社会监督，尤其是监督官员腐败行为的开端。

一、舆论引发

2011年4月10日，周文彬做了自首的决定。在当天发布的微博消息上，周文彬表示：“我可能要做出一个人生中艰难的决定，这个决定足以改变我的后半生，我也为此成为另类。”引发这次“自首式”举报的导火索是因为在此之前，他也曾向《中国青年报》递交了一份实名举报材料，他的举报信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因此，他决定以“行贿罪自首”形式通过微博平台向亳州市纪委或检察院举报。^②这是微博反腐事件的开端。

（一）发布用户

作为本次事件的主人公，周文彬在“自首式”举报事件发生前，已经在利辛县国土资源局工作10多年。在此期间他通过考试，担任了胡集镇国土资源所所长一职。在他任所长一年试用期满后，于2009年3月被免职。随后，他被调到利辛县国土资源局地矿股，成为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他举报的腐败事件发生在他于国土资源局任职期间，因为他之前曾经多次向有关部门举报他的领导却得不到回应，所以才有了微博自首举报事件的发生。

（二）消息文本

2011年4月10日，从周文彬发布的第一条微博信息开始，他用微博直播自

^① 郝永华,芦何秋.网民集体行动的动力机制探析——以“郭美美事件”为研究个案[J].国际新闻界,2012(3):61-66.

^② 丁先明.安徽省利辛县:官员微博直播自首式举报,爆窝案[N].新华网,2011-04-14.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1-04/14/c_121302007_2.html.

首先的方式对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国土资源局相关领导干部的违规罢免行为进行举报。最早转发周文彬相关微博消息的是一位杭州电视台的新闻评论员；4月12日，《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转发了周文彬的微博，网络围观也正式开始；4月14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报道了此事。截至4月15日20时，共有4363名微博用户转发、评论和点赞了该条微博消息，包括《新京报》《中国青年报》在内的多家媒体报道此事件，新华网、搜狐网和新浪网等主流门户网站也转载了相关报道。^①

（三）信息反应

对这一事件，有网民质疑是个人炒作，以增加关注度，更多网民认为，这可能是官员“良心发现，为了心灵的自我救赎”。网民的评论符合他们希望进行社会监督的群体心理，同时在群体事件中也不乏偏激的言论，这也是群体事件中的网民容易变得冲动易怒的体现。

（四）传播效果

从2011年4月10日开始到4月13日，这条内容为“这次下自首的决心对我来说是多么的痛苦！我没有告诉家里任何人，也没有告诉任何亲戚……”的微博消息评论和转发开始突破100。在这一阶段，有更多的认证微博用户参与到转发与评论中，周文彬的这条微博消息发布两天之后，得到了最大的传播效果。《中国青年报》记者丁先明参与到微博的转发评论中，媒体从业者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让大量的微博用户关注该事件，这条微博消息的评论量与转发量达到顶峰。在此之后，周文彬的微博消息自首直播的内容转为对自身行为的直播，文字较为平淡，随着事态热度的下降，受众的关注也逐渐减弱，最后在2011年5月31日，周文彬发布了事件最终的处理结果，宣告了整个事件的结束。

从周文彬微博直播自首事件中用户的行为模式（见图2-1）可以看出：在这一过程中，周文彬首先通过微博消息获得一定的关注度，为微博用户揭示微博直播的开端和原因；其次高潮部分是对自身进行微博反腐这一过程的直播，利用微博的即时传播，形成话题，制造了一定的媒介奇观，受众对这一事件是否有戏剧性的发展会产生一定的期待，使传播效果达到最大；最后是对于事件结果的呈现，受众的反应也经过一定的时间后趋于平静。

^① 靖鸣,陈阳洋.从官员微博直播自首看微博舆论监督形态、特性与监管[J].新闻与写作,2011(5):3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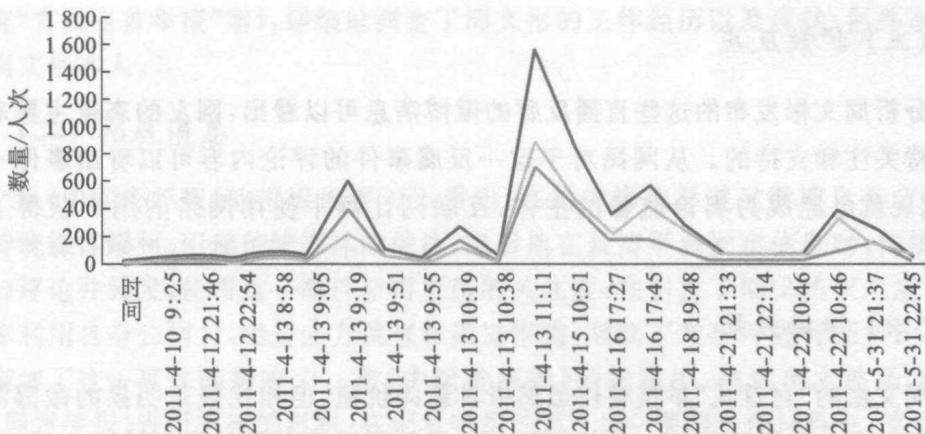


图 2-1 周文彬“自首式”举报事件微博消息影响力分析

二、舆论扩散

(一) 扩散用户

在周文彬“自首式”举报事件中,最主要的扩散用户为《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丁先明(微博已注销)。在此之前,周文彬对于《中国青年报》丁先明的微博进行过评论与转发,因此也获得了该记者的关注。截至目前,《中国青年报》的官方微博有百万粉丝,在新闻尤其是政务新闻上有重要的影响力和关注度,因此《中国青年报》记者对于周文彬事件的关注与转发,对于信息的扩散有重要的影响。作为媒体性质的微博用户,相比普通微博用户更加理性,更具公信力,对于公共事件的讨论更容易聚集网民的关注。

(二) 扩散消息

2011年4月13日上午11点11分,周文彬发布微博消息:“我已到了亳州,5分钟到纪委,感谢大家一路陪伴。”^①这条微博转发量与评论量分别为870和663,标志着周文彬自首举报腐败的开始,也由于媒体微博和媒体从业者微博的关注,因此得到了较大的传播效果。转发评论的内容主要有这几方面:支持周文彬、关注周文彬近况以及希望政务公开。在之前社交网络还没有如此普及时,普通的民众是很难对腐败现象进行监督,也导致了目前他们对于腐败查处“暗箱操作”的担忧。

① 摘录自周文彬微博消息内容,2011年4月13日发布。